

龍應台天長地久反思 從家族歷史追溯國族命運

江迅

http://www.yzzk.com/cfm/content_archive.cfm?id=1525318972039&docissue=2018-18

2018年5月13日 第32卷 18期

龍應台新書《天長地久——給美君的信》，以寫給失智母親應美君的十九封信，穿插紀錄戰亂和離散的圖文，談生死，談世代，從家族歷史追溯國族命運。這十九封信，是對生命信念的親身實踐，是對上一代的感恩致敬，是對下一代的溫柔提醒。二零一七年八月，龍應台帶著愛貓、愛書，移居台灣南部的屏東潮州鎮，陪伴年邁母親，並回到「文人安靜的書桌」，開始鄉居寫作，也修復了她對大環境沮喪的心。



龍應台新書《天長地久》台灣版（左）與香港版



馬英九到屏東探望龍應台



龍應台讓母親感受體溫



龍應台與母親逛市場（圖：龍應台臉書）

台灣屏東「太陽城」，依山傍海，青蔥蒼翠。台灣前總統馬英九低調下屏東，專程去看望「失業部長」龍應台的生活。那天是三月六日。他們走訪原住民部落，拜訪花農。清晨七點，晨走完了，龍應台帶馬英九先到市場吃一碗大腸麵線，好吃，再加一碗肉羹。隔壁是水果攤，水果特別漂亮，沒想到，馬英九當場叫賣，人們循聲望來，發現竟然是前總統，紛紛湧來合影，一個戴斗笠的鄉親使勁擠進人圈，抓住馬英九的手，極為認真地說：「太辛苦了。」龍應台接著帶馬英九踏進比悠瑪部落的小學去看木棉樹，小學生正在上體育課，突然小鹿似地奔向馬英九，

不知他說了什麼，孩子們笑得前仰後翻。「在部落裏行走，沿路都是野鴿子的咕咕聲，今日有微微春雨」。

有人在屏東竹田天使花園見到馬英九和龍應台身影，花園主人在臉書上說，馬前總統很低調，龍老師特別帶他來欣賞文心蘭；另有網友寫道，「第一次與前總統零距離拍照，真是嚇死寶寶了，還和他握手吶」。

龍應台也在臉書上講述了她與他的互動，不過沒有寫出他的人名。龍應台稱，兩人都是篤信法治之人，因此工作之時「他不找我，我不找他」，「一起工作三年，不曾在工作之外見過面。二零一四年十二月，我決定自我『失業』之後，他還在那深院裏熬夜打工，不見面，不打電話。公私之分明，真是等到兩人都『失業』之後，多年封箱朋友首度相聚，我也首度破戒寫他」。

失業部長接待失業總統

龍應台在臉書上說：「我失業了我自由。他失業了他不自由。制度規定，失業後的八年，他到任何地方都不能脫離一大群隨扈的保護視線。」雖然體制終究必須尊重，但龍應台還是堅持自己開車，「他坐我的車……今天我是接待一個朋友，不是在接待誰……不行，違反規定。好吧，就做個樣子拍張照」。龍應台在臉書寫道：失業部長駕車，失業總統坐旁邊，別人坐後面大位。

龍應台說：「他知道我剛剛完成書稿，說要下鄉來『看一下失業部長的生活』，我說，那就來感受一下我的普羅旺斯吧。不要有媒體，讓我們走路去菜市場……」

龍應台完成的書稿，是《天長地久——給美君的信》（台版：天下雜誌出版；港版：天地圖書出版）。美君是龍應台的母親，九十三歲，失智多年。直呼母親為美君，是要視她為朋友。六十五歲的龍應台，以寫給失智母親應美君的十九封信，穿插紀錄戰亂和離散的圖文，談生死，談世代，從家族歷史追溯國族命運。二零一七年秋，龍應台起心動念寫信給美君，開始在台灣《天下雜誌》的「美君」專欄，每月兩次，十九封信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下旬結集出版。用龍應台的話說，「如果不是這一個月兩次的『強迫』約會，我可能在那個『歷史虛無』的野溪裏自我放逐更久，『給美君的信』成為我在懷疑時代裏一個人的功課」。龍應台說《天長地久》這本書是她生命課程的延續。這十九封信，是對生命信念的親身實踐，是對上一代的感恩致敬，是對下一代的溫柔提醒。《天長地久》是一本向女性致敬的書，對母輩的不捨與疼惜。她提醒二、三十歲的年輕讀者，要注意父母親正在「初老」，從現在開始陪伴父母都來得及。

二月一個早上，龍應台正在思索《天長地久》封面時，香港好友黃效文傳了幾張照片給她。林邊雪地振翅飛起的孤鶴、積雪中回首凝眸的母鹿，一下子融化了她的心。龍應台說，「前者遼闊中有依依追尋，後者荒涼中有無言深情，都是我寫這本書的離索心境——既寒冷又溫暖，既甜蜜又悲傷，既孤獨失落又天地相隨；這位探險家慷慨賜予我使用權。選哪一個做封面呢？我愛那母鹿凝眸，我愛那雪鶴蒼茫」。最後她選擇了丹頂鶴。青黑的森林、雪白的大地，純淨的翅膀、專注的眼睛，它用力、用心、用此生所有的力量，飛向天長地久。龍應台說，「天長地久」四個字，採自王羲之的字。他的「初月帖」、「喪亂帖」墨跡斑斑，道盡人間情長辭短。

四月二十六日晚上七點，台北市中山堂，《天長地久》首場讀者見面會，八百聽眾，上到八十一歲，小至五歲的讀者，紅衣黑褲的龍應台，先是站在台上與讀者分享寫這部新書的感悟，整

整兩小時，而後又持續握筆簽書，同樣是一百二十分鐘。據香港書展主辦方透露，龍應台已與香港和大陸讀者約定，七月二十二日，香港書展《名作家講座系列》上，她將再度與讀者分享。

龍應台的新書是提醒讀者兩件事：一是，人生裏有些事，就是不能蹉跎。生命的課要及早修，及早實踐，因為生命如不回頭的列車，過站不停。另一提醒就是：上一代人不是電線上的鳥，鳥其實來自電線後面的深林大山，他們的時代被理解了，你的愛才是真實的，有溫度的愛。

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，龍應台宣布辭去台灣文化部長一職，她清空部長辦公室，回到「文人安靜的書桌」。但是，她無法寫作，用她的話說：「只要提筆，一個冰涼的問題就會浮現：文字，還有用嗎？」三年的政務折衝，令她失望而灰心，「民主制度要建立十分困難，要摧毀卻十分容易，真令人沮喪」，讓她在「前線」、「戰壕」裏看到「一個時代的崩解，價值的潰散」，「台灣這些年來的政治紛爭激烈，整個社會相當撕裂」，「我看不到文字和思想在這個大潰散中可以立足在哪裏」。

四月十九日，龍應台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時說：「別人都說當官當久了，下來之後很難適應，但我一直有一種信心，我覺得沒問題。當官對我而言，只是一個社會服務而已。從文化部下來之後，我哪兒都沒去，就繼續留在台北，開始新的生活。第一年忙著搬出官舍，整理房屋，安頓自己的生活。但後來又留了兩年，現在回頭看覺得是徹底浪費了那兩年，我應該早早離開的。台北對我而言，就是一個被國家大事揪心籠罩的工作氣泡。我自以為雖然還在那個氣泡裏，但心裏可以創造一個清明的天地。其實做不到。每天看著台灣的政治狀況，心裏很糾結，但一時還沒領悟到問題出在哪裏。就在這樣的情緒裏生活了兩年。」

二零一七年八月，龍應台帶著愛貓、愛書，移居屏東潮州鎮。她原本只是單純地希望趕快到鄉下屏東陪伴年邁的母親，沒想到屏東這片土地，修復了她對大環境沮喪的心。回到「文人安靜的書桌」，開始鄉居寫作，於是有了《天長地久》一書。到了鄉下，從她的臉書可以看出她的快樂指數很高。她看到了另一個世界，看到台灣鄉村，當然它也有它的問題，但是在鄉村裏她感受到一種安靜的、穩定的、靜水流深的文明。她說：「過去九個月使我心理復甦，是對民主社會信心重建的一個階段，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這對於歷史的理解和對社會的觀察，是一個重新梳理的過程。」

龍應台說：「當初決定放下一切去鄉下的時候，只有一個單純想法，就是要陪伴母親人生最後一里路。到了那裏，腳踩在泥土上之後，我才慢慢發現，我本來就是一個從頭到尾生在鄉下，長在農村，長在漁村的一個人，也沒住過眷村，從小講閩南語。這次搬回去才發現，十八歲離開農村，六十五歲回來，中間經過了四十七年了，為了美君我是真正回到了原鄉。」

雖然大半輩子跑遍美國、歐洲、香港、台北，再回到台灣鄉下，但龍應台發現她馬上和南方的心靈銜接，「好像從來就沒離開過」。彷彿一切就是以南方為起點，屏東的小鎮成為她另一個和台北「平行」的家。龍應台熟悉南方，以前也常常南下探望母親，但要從熟悉的台北搬到屏東長住，還是需要下很大決心。她說，過去自己常常在台北和朋友聚會時，內心深處總有一絲隱隱的不安，「因為心裏知道：這個世界此刻最需要你的人，在南方」。

龍應台用「逗」的方式設法讓失智的母親聽見女兒的聲音。「請問應美君在不在？」龍應台俯身緊貼著美君的耳朵問，聽到她母親輕輕說「在啊」，龍應台一陣開心：「應美君在不在？在

啊，我聽到了，真的！」媽媽已經完全無法跟女兒對話，甚至不知道面前的她是誰。龍應台說，「可是當我坐在她身邊，身子貼著她，握著她手的時候，她至少會感受到我對她的溫暖，這是非常非常明確的」。龍應台用輪椅推著母親上菜市場，在家用可可脂按摩她手臂，她發現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譬如看書時，她就坐在美君身旁緊靠著，讓母親感受她的體溫。她每天陪著母親看日出日落，即使是一句簡單對白：「幫你熱一杯牛奶，好嗎？」就足夠讓龍應台內心踏實。

龍應台說：「在六十五歲生涯裏，有三十多年不在台灣。等回到台灣，又忙於自己的寫作、自己的教學、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孩子。最近十五年，我才認識到，所謂永遠的訣別，並不是只有死亡才叫永別。這一輩子對我恩情最深最大的人，也就是父母。他們的失智就是訣別的開始。失智是一種慢慢的、逐漸的永別。我發現自己幾乎就錯過了，對他們感恩致謝的任何機會。」

龍應台說，在「文化部」一千天，「文化部」的「第一里路」只有一次，母親的「最後一里路」，也只有一次，同屬人生中不可錯失的飲水思源報答時機。她起心動念給美君寫信，透過書寫，讓她這一輩的同齡讀者，或者年輕十歲、二十歲的讀者明白，「人生有些事是不能蹉跎的，機會是這世界上最殘忍的情人，也許戀過你，可是一旦轉身，絕不回頭」。許多讀者看到她「寫給美君的信」，立刻打電話跟自己媽媽問候、回家探望媽媽，或帶著媽媽去旅行等，能引起讀者如此共鳴令她感到欣慰。

美君的所愛而「天涯與共」的人，即龍應台父親槐生，一九一九年出生在中國湖南一個山溝溝的農村裏。「一個家徒四壁的草房裏，二十五歲農婦龍正坤，村裏窮秀才的女兒，欣喜萬分生了一個健康的兒子，命名槐生」。龍應台在書中寫道，「這一年的六月二十八日，巴黎西南大約二十公里處的凡爾賽宮擠滿了人。皇宮的一個側廳裏，各國政要和將軍們不顧體面，緊張得站到了椅子上，伸長脖子看向隔壁的『鏡廳』；從一年前巴黎和約一直吵到此刻的凡爾賽條約，就要在這個廳裏簽字了……德國的一戰賠款，到二零一零年十月三日，才付出最後一筆」。

《凡爾賽和約》，全稱《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》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和約，其主要目的是懲罰和削弱德國。這一條約對中國以後的歷史發展起了重要作用。龍應台的父親出生在這一年，一個普通個體的誕生融入了歷史光環。緊接著，龍應台在書中繼續寫一九一九年，從「凡爾賽」寫到「烈士」，寫到「荒村」。「列強竟然把德國在中國佔領的權力送給了日本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大批憤怒的學生衝進外交總長曹汝霖的家……」

書中，一九二五年，一九二八年，一九三五年，一九四四年，一九五零年，二零一七年……一個個重要年份，記載家族歷史，追溯國族命運。

在美君七十五歲那年，龍應台帶著她回家鄉杭州。龍應台在書中寫道：「在『濃得化不開』的鄉音氛圍裏，你像午夜白曇花一樣打開了。我從沒見過你——一輩子端莊矜持的你，那麼豪放地飲酒歡笑，也沒見過你那麼放縱地流露感情；你和一個好看的中年杭州男子說家鄉話，他尊敬地看著你，而你回報的是一種純情的、天真的、女性神魂的濃郁散發。我拿著酒杯坐在一旁，不說話，心中震撼：鄉音有怎樣一種顛倒乾坤的勾魂魔力啊，勾到你心深處一根以為早已斷裂萎縮的弦，使得你一時之間忘記了你的杭州青春時期，和今日的此時此刻，這中間已經物換星移春秋幾度。」

龍應台對亞洲週刊說，愛家鄉是基本人權，任何人都應該尊重。「我母親在七十五歲時回到浙江，在大家都講浙江話的環境中，她完全忘記自己是個離鄉五十年的人，連年齡都忘記了。她的世界天地大旋轉，頓時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。一九八五年，我第一次到湖南，對我最大的震撼是，走在馬路上，聽到來來去去的路人講的是和我父親一樣的話，我嚇一跳，在台灣用這種口音講話的只有我的父輩，所以就變成了一種制式反應，凡碰見講這種語音的人，你就要很恭敬地對待，即使對方是一個毛頭小子，很好笑。家鄉是一個非常深的大樹的根，這個是任何人、任何社會都要尊重的。」

龍應台說，生命本身是全方位的，兩岸之間的關係也不是簡單的只是政治關係。她說：「去湖南掃墓時想到，如果父親的墳不在這裏，我會不會這樣不辭千里來湖南？我住在倫敦的兒子說，以後媽媽走了，如果台灣沒有媽媽的墳，或許以後和台灣的情感聯繫就斷了。但是當有一塊石頭在那裏的時候，很可能就變成兄弟兩人約定每年去一次台灣。這種聯繫不僅僅是兩岸，也可以是倫敦和台北。一九四九年，有二百萬人被迫離鄉背井來到台灣，這些人和大陸有一種文化的歷史情感關係，這種情感關係和政治關係是可以分開談的，不需要用政治去窄化了所有的歷史跟文化的情感。一個開放的成熟的社會，它的趨向和它的特點應該是更大的包容和開闊。」

她續說：「台灣過去這七十年的成就確實了不起，它從戰爭的流離失所，從戰後經濟的破敗之中站起來，開創一個華人世界中貨真價實的開放型社會，就是了不起。但我現在擔心的是，過去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築在中國這個巨人睡著了半個世紀，它現在突然醒過來站起來，你才發現它是如此巨大，這就是歷史現實，台灣要非常有智慧找到新的生存策略。在台灣現有的已經不多的優勢裏，包容、開放、自由是台灣最重要的資產，我們有義務用制度去維護這個社會的包容、開闊和自由。台灣如果連制度本身都破壞了的話，我們將一無所有。」

龍應台在屏東鄉間趴趴走，新朋友都是農民。三月二十日她在臉書上講述農委會頒發的神農獎，造就了新農業的「愛因斯坦俱樂部」，讓她移居南方後，「談笑有神農，來往無白丁」，「滿腦子都是蓮霧棗子文心蘭玫瑰花」，她寫道，「種蓮霧的黃進文、種棗子的潘志民，談蓮霧棗子時的專注、自豪，和科學家丁肇中朱經武談物理一個表情。培養萬代蘭文心蘭的陳宏志、培養『米蘭爸爸』玫瑰花的楊添得，談起花來，和林百里童子賢談電子科技一樣的神態」，「神農們一個一個成了我的老師」。她形容他們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新「農民」，「噓，政客們啊，小聲點吧！台灣最值得維護的美好，在這些人身上」。

問龍應台，離開台北那個令她失望而糾結的政治躁動的「大氣泡」，還會努力去改變現狀嗎？她若有所思：「我並沒有下一個結論說，我徹底遠離了，不管了。我相信公民不可以放棄自己的責任。只是面對現狀還不知道怎麼辦，我在糾結中。作為一個公民，我也還沒有找到一個應對這個現實的最佳方法。」身在屏東陪伴母親，龍應台依舊沒有「遠離」。讀她的臉書，依然能感受她內心的「家國情懷」。

龍應台的家國情懷。家與國，在中國人心中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，修身齊家，治國平天下的理想，家國同構是儒家文化的精髓。國家、社會、家庭和人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，這種情感可以歸納成為「家國情懷」。重視親情，心懷天下，行孝盡忠，天下為公。■